

13
28
临夏市文史资料选

(四)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甘肃省临夏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



Y177.12

临夏市文史资料选

第四辑

临夏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目 录

邓隆先生传·····	张思温 (1)
河州邓德舆先生诗选·····	张思温 (17)
简介提督萧福祿·····	冯国栋 (81)
回忆鲁谭愚先生·····	陈省三口述 陈中和整理 (82)
浅谈临夏地区养蜂业发展概况·····	阮国梁 (86)
我在临夏地区养蜂的经过·····	阮国梁 (91)
临夏县政府档案转移记·····	冯国栋 (102)
裴建準在临夏所办的军民学校·····	刘岐山 (106)
回忆在黄埔军校受训前后·····	王廷俊 (109)
万寿观琐记·····	张思温 (117)
重修万寿观纪事·····	姬润、高云鹏、刘岐山 (123)

来函照登:

- (一) 对《清末回族举人喇世俊》一文的补充
·····喇家均 (127)
- (二) 关于《徐绍烈先生史略》一文的补充与更正
·····冯国栋 (128)

邓隆先生传

张思温

邓隆是甘肃知名人士，在二十世纪之初，对甘肃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诸方面都有影响。他是甘肃的第一个民族资本家，第一个研究西夏文的学者。生平著作很多，歿后多已散失，其生平现知者不多。本文作者曾为他办过文牍，又有世谊，故就所知，拉杂写成此篇。体例自觉不够严谨，错误遗漏也恐不免，希望指正！

（一）

邓 隆 生 平

邓隆（1884——1938），字德舆，号玉堂，又号隰巢子，隰巢居士，甘肃省临夏市人。他的生父是临夏县北塬刘仲家村农民仲姓，为县城西门外邓家庄的农民邓国琛（字熙斋）抱养为嗣。国琛于务农外兼做豆腐为业。夫妇未生子女，对邓隆极为珍爱。长大以后，选择本县名师王朝弼，命在其塾中读书，束脩①从优。邓隆少年好学，多买参考书籍，其父家虽不丰，尽力满足需要，从不吝惜。故进步甚快。十几岁就考取入学，成了秀才。这时云南进士杨增新任河州知州。选拔了一批中过举、入了学的知识青年数十人，在州衙读书，供给膏火②，有时、亲自讲授，加以培养。如

举人杨清（字子洁）、秀才金树仁（字德庵）、徐谦（字益珊）、邓隆、张建（字质生）、陈继善（字元卿）等，皆知名之士。一面令学习时文，准备在乡试、会试时能以入选；一面也令讲求经世之学。聘天水周务学督课，每月考试，按成绩给予奖励。以后这些人多在杨增新任新疆省督军时成为他的得力助手。邓隆还与张建、金世清（廉丞）共同租赁州城内显庆寺僧房，下帷苦读，互相讨论、交换心得，学业日进。光绪二十九年（1903）乡试，邓隆中了解元。第二年（1904）会试，联捷成进士。以知县分发四川任用。次年（1905）到成都，当时任四川总督的是满人锡良（字清弼），以邓少年文士，先留在幕府文案办事。试用称职，得到锡良赏识，令其广阅督府档案，熟悉法令规章及各种例案，为以后从政打下了基础。

光绪三十三年（1907）任重庆香国寺厘金分卡委员。鸦片战争之后，重庆成为通商口岸之一，驻有五个国家的领事。往往违反条约，私运货物，偷税漏税。邓任事后，在这一年的夏秋之间，查出德国领事坐船夹带私货海带九千余斤，并违约凭单朦运台州谦信洋行洋靛油五十桶。照章扣留，充公罚办。此事发生后，德国领事向重庆货厘总局提出无理要求。邓根据条约往复交涉，并建议封闭非法在通商口岸私设的谦信洋行。最后，德国领事理屈词穷，不得不接受处理办法认罚，并向货厘总办黄俊臣道歉。从此杜绝了驻四川省的外国领事馆的人员夹带私货及藉单冒运之弊。其后，又有勒令英国传教士陶维义照章完纳厘金之事。因此受人称赞。有一次黄俊臣宴请五国领事，由邓及其他两位委员作陪。德国领事与邓握手，表示敬意，并向其他领事介绍说：

“邓委员熟习条约，长于交涉，诸君须自爱，勿违约妄干”。在清末政治腐败，官吏惧外、媚外成风之时，一个新进少年，敢于据理力争，维护了国家的权利与尊严，是很难得的。

随后，署理新都县知县，盗不入境，受到“传旨嘉奖”。继又实任南充县知县，也能不徇绅士情面，打击帮会势力。曾代理过顺庆府知府。宣统三年（1911）春，以母丧丁忧回里。

邓隆回籍葬母已毕，即在兰州城南构筑别墅“拙园”（即今甘肃省军区一部分地址），从此长期定居兰州。

辛亥革命以后，邓隆曾参加中国国民党，历任甘肃省议会议员（1912），甘肃省参事会参事，甘肃官银号坐办（1914——1920），甘肃自治筹备处处长（1925），甘肃戒烟总局局长（1926），甘肃印花税处处长，甘肃造币厂监督，甘肃樵运局局长（以上1930年），夏河县县长（1930至1935年）等职。从此罢官、致力于宗教、慈善团体事业。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阴历十二月二十七日）歿于兰州。距1884年（清光绪十年三月十一日）生于河州（今临夏），享年五十四岁。初葬于兰州龚家湾。后迁葬韩家坪公墓。娶妻邵氏，生子春暄。后娶赵佩弦、赵佩韦。佩弦生子春冀，女春薇。

注：① 送给老师的学费。② 即“奖学金”。③ 张质生《退思堂文稿》卷二：《书邓德舆》。

（二）

邓隆在甘肃的政治、经济、社会活动大致如下：

1、辛亥革命后，陕甘总督长庚与前总督升允皆系满

族，派遣军队援陕，与民军作战。以后天水黄钺独立，响应民军，而兰州也宣布承认共和，于1912年阴历正月十八日组织成立甘肃省諮议局临时会，选举李鉴亭（名镜清、临洮人）为会长，刘晓岚（名尔忻、兰州人）为副会长，由全省各府、州所举参议员帮同原諮议局议长张筱邬（名林炎、兰州人）共同会议致电北京承认共和，并劝黄钺取消独立，免开战端。邓在这一政治转变中是积极参与者。他在临时议会开会时提出“联络官绅、调和汉回”的口号。并在临时议会提出了“豁免前清积欠钱粮”、“停借公债”、“预备省议会正式选举”“筹办城乡自治”、“查收罌粟地税”、“办理陇右民报”等提案，同时向主持省政当局条陈建议“组织银行”、“筹办实业”等事。

2、邓回甘以后，对临夏地方各种事业及民间疾苦多有建议及帮助。如河州自清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元年（1906—1909）苦旱，陕甘总督升允曾电报全省灾情，得国家赈款及各省捐助赈款三、四十万两、全省其他灾区如皋兰等县按赈款发放。而河州领银一万九千余两，因不知是赈济款，仅发给每重灾户粮一斛，作为借款。宣统二年（1910）又由甘肃布政司发给籽种银库平一万五千两，每户借给兰平银六钱，作为春耕籽种之用。但后来令每户按仓斗二斗折纳粮食。受灾后的人民无力偿纳。邓隆与地方绅士呈请在省库所存赈款余银十余万两内将所借籽种银一万余两拨还，不再追收；将已收仓斗粮二百余石，准原纳各户抵完下忙正粮。对前借银一万九千余两，因有添借河州镇属兵粮，仍照收归还。邓又多方反映情况，但在当时官僚主义政府互相推诿，这个意见，竟未得准，仍向借款灾民收粮还银。当初借钱之时，每户仅得

钱三四百文至五六百文，收麦之时，照例仓斗每斗只合市升三升。实际按四斗以上折收，加上房科需索每户“票子”钱实钱三十文。灾民吃亏甚大。

又民国初年导河县因灾情将正粮每斗折价交银四钱八分。而折收时又加征三钱，美其名为设立义仓，以备军粮。实则是借义仓备荒之名，作买粮备供军食之用，对此额外苛派，邓与地方人士呈请免予摊派。但这些努力，没有群众斗争，结果自然是徒劳的。

3、在兰州成立“导河县旅省公社（即同乡会，地址设庄严寺），联合旅省同乡研究本县地方公益事业，先从教育入手，联络感情，促进文明。并提出了办“塾师讲习所”，提高私塾师资，拟定改良私塾规程。

4、河州原有屯地（原来军垦之地），每年每斗地（二亩半）征牧青禾一斗。而民地（农民自有之地）每年每斗地征收小麦一升一合五勺至一升七合五勺。屯地负担偏重。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知州杨增新呈请将东、南、北三乡屯地准纳小麦五升。西乡照旧，以供马料及喇嘛寺之用。后任知州又以西、南乡土地一样（都是山阴地区）仍照旧征收青禾。邓隆等请求一律按小麦五升征收。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改屯为民。改变了这一不合理的负担。

5、邓隆对于公益慈善事业甚为热心。如：1920年海、固大地震后，多方劝捐赈济、自己首先一次捐款二百元银币以为倡。1928年临夏地方发生变乱，战祸蔓延，人民流离失所，邓隆、张建等募捐救济，向兰州和新疆的临夏同乡及社会人士募捐，时金树仁任新疆主席，徐益珊任财政厅长，其

余临夏同乡在新居官者多，故新疆助赈较多，及时发放急赈，减轻难民痛苦。乱事吃紧之时，邓曾至永靖，劝谕汉回人民，1929年元月一日，邓由临洮经今康乐、广河、和政、至临夏及永靖等地携带衣服、钱粮、药物、沿途调查灾情并施赈，同时省城则由张建等负责资助遣送难民上庄。1929年又逢大旱，邓于是年任华洋义赈会甘肃分会会长及甘肃赈务会委员，对甘肃赈灾事极为尽力。春耕时又与张建（质生）何全志（正庵）等前往临夏发放灾民籽种、农具及粮食、赈款等，因旱情持续发展，乱事尚未完全稳定，难民不能上庄，集聚城内的多因饥饿疾病，日有死亡，又雇人掩埋尸体。同时与张质生作了很多诗歌，纪述了现实情状。为时传诵。南京全国赈务会会长许世英作了《读邓、张二先生诗》的长歌表示同情。所以邓死后永靖县绅民专门开会追悼，并欲为邓建祠以为纪念，可见乡里爱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实行征兵制度，因国民党政治腐败，官僚主义严重，甘肃应征壮丁首批集中兰州华林山待发，时发生疾病，缺乏照料，多有死亡。邓以甘肃佛教会会长身份奔走呼吁，并施医药、亲去慰问照料，早往暮归，一连几天没有得到很好休息，壮丁先后治愈了四百多人，邓竟传染得病，以致不起。

6、创办实业

民国初年，邓隆首先倡办实业，成为甘肃的第一个民族资本家。首先集资设立了光明火柴公司，甘肃织呢公司，河源采木公司等。但甘肃当时是个穷省，交通不便，邓隆自己资本也不雄厚，又难引用较好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所以发展不大。除了光明火柴公司维持到兰州解放以后外，织呢、采木都中途停办。这三个企业，都采取股份有限公司形式，

简况如下：

①光明火柴公司，成立于民国初年，地址在兰州黄河北岸之烧盐沟口，有简单机器设备，大部为手工操作。创办时邓自任经理，陕西人高某任协理。邓死后由张善卿继续经理。产品行销甘肃、青海等省。是甘肃最先成立的第一家火柴厂，本身虽然发展不大，却起了示范作用，带动了全省各地仿办了许多厂子，这个厂一直维持生产到解放以后，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时，公私合营，后又合并于天水火柴厂。

②兰州织呢公司于1919年成立，是利用前清光绪年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进口的毛纺织机器，恢复制造。地点在兰州杨家巷，厂房、设备，全部都是旧物。只能生产粗呢，并且原有机器的织多于纺，不很协调，先为官商合办；后来承租商办，全为私股。开办时邓自任经理，牛裁坤（临洮人，字厚泽）任协理。到了1925年，以所产粗呢质量很低，成本又高。甘肃的城市穿用呢料的不多，并且嫌粗，农村则认为还不如穿自织毛褐，所以销路不好；运销外地时又受外国商品的排挤，更打不开局面。就于这一年左右停办。

③河源采木公司，于1918年筹备，业务未及展开，即告夭折。由邓独资改办森茂公司，由梁钧（字灼三，临夏人）任经理。以后改为木厂，由杨鳌（字策六，临夏人）任经理。维持到1928年左右结束。

这些企业的失败与停滞，有其各种原因，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民族资本不可能顺利发展，在当时贫穷落后的甘肃更是如此。挫伤了邓的积极性。

此外1930年，因兰州市南郊农圃用水不足，邓提倡集资于城北白云观附近（今滨河路）修建水车三部，引黄河水进

入上、下沟渠道，增加灌溉水量。也因水车的高度限制，水位较低，受益不多，水车岁修无人负责，不久即废。

（三）

1、邓隆关于民族宗教的研究

临夏是个多民族多宗教地区，邓隆出生在这个地方，对民族宗教问题常有接触，自然关心。他在民国初年在议会呼吁“调和汉回”；以后在他的著作中都表示民族平等的观点，希望民族团结。他对宗教问题，很感兴趣，曾作过广泛的研究。初在兰州时，从事道教的研究，和兰州马祖庙道人李烟霞多有来往，讲求修养之法并合资买了一部《道藏》（道教大藏经，抗战时运往临夏万寿观存放）进行研究。后来又专门研究佛学，特别研究密宗。精通佛教理论、于拙园建“藏经楼”^①抔土为十万佛像，筑塔砌储于园中。又涉猎西夏文、藏文佛经，有所译述。在分纂《甘肃通志》的宗教、民族、土司各志时，叙述原委、颇为详备。他曾担任过甘肃救世新教会会长、甘肃佛教会会长。

2、邓隆对西夏文、藏文佛经的研究与译著

邓隆对于西夏文、藏文佛经的著作。歿后多已散失，经多年搜集，能见原著或可知其名者，如有关西夏文的有：《西夏译妙法莲华经考释补》、《西夏译华严经、入法界品考

注^①：此楼木结构三间原在兰州柏道路，传为明建，有肃藩手书“听雨楼”匾额，邓买得后移建拙园，今楼尚在而匾不见。

释》、《西夏文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考证》、《书武威县西夏感通塔碑后》等，有关藏文的，如《密宗四上师传》、《大智宗喀巴大传事略》、《嘉木样传》、《麦拉祖师传》、《题宗喀巴画像》、《题多罗菩萨画像》、《书临洮正觉寺（今属康乐县）永乐敕书（汉藏文对书）后》以及《密藏问津录》、《番佛名义》、《藏文注解》、《文字般若集》、并敦煌石室所藏藏文长寿经译文及题识等。

在甘肃研究西夏文的以邓隆为最早。十九世纪第十年代之初、武威张澍发现了西夏文《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之后、因有汉文对译，成为探索这一文字的工具。二十世纪之初，俄国人从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城盗掘大量西夏文物，运往俄国，其中有西夏文佛经和其他书籍、文书，并有字书、辞书、引起世界上的广泛注意，各国学者才有较多资料进行研究。1914年，我国罗福成所作《西夏译莲华经考释》发表后传至甘肃，邓隆对之感到兴趣，进行探索。《掌中珠》本是在黑城出土的汉文与西夏文对译的字书，但当时甘肃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的情况下，也难以找到。邓隆就凭他渊博的佛学知识和刻苦钻研精神，对罗的《考释》作了补正。并把自己所藏西夏之《华严经》残卷作了考释考证。虽然还在西夏文初期探索阶段。但不愧为甘肃研究西夏文的先驱者。他治学之勤，和筚路蓝缕精神，是值得钦佩的。他在《西夏译莲华经考释补》自序中说：

“光绪庚子，法人毛利瑟得《西夏译妙法莲华经》，考定十有八行，间有疑而未定者，上虞罗福成为之补释，并将日本羽田学士所赠《法华经》三纸另为考释校写。此为吾国研究西夏文之始。余初得西夏经，不知何种，得此考证，知

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入法界品》及《普贤祈愿品》。参互援引、觉罗氏考释尚不免错误遗漏。至少文法颠倒错综，不加说明，更不易读。乃发心略为补缀。释《华严经》时，以汉文为主，另注夏文不同之故。兹仍罗氏之例，以西夏文为主，用汉译考证于后。二者参观，当可知西夏文之大凡。

在《书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后》说：

“此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十八章中残片，余得自灵武废塔。计八百余年旧物也。元昊创为西夏字，方密繁重，不合世界文字进化公例，故其时虽设蕃汉学院，国中艺文浩牒，尽易此体。未几，国亡字废，并文献掌故湮没不传，说者谓咎在制蕃书而屏汉文。宜其然乎？唯自元昊迄乾定亡国，通行垂二百年，能译佛经及《周易》、《孝经》、《尔雅》，亦震旦文字史上纪念品也。……余既得西夏经，欲事考证，无从求《掌中珠》，仅据武威天佑民安《感通塔碑》暗中摸索、嗣见罗福成《西夏译莲华经考释》细译毛氏释文及东洋学院藏本，比附参考，乃知余所有者《大广佛华严经》也。此经凡八十一卷，龙藏佛经除般若外，卷帙最多，尚不知其何品也。次乃考得数十字，因知卷品页数。揣摩匝月，仅得门径，微特文字难辨，即其文体颠倒简略，仍非对照汉文，便可按图索骥、……爰将此篇汉译附录于后，附注西夏文法、聊举一隅。若有博学鸿儒，据《掌中珠》纂西夏字典，俾世界藏西夏文者，得窥全豹，是亦西北一段佳话也，不禁馨香祝之”。

在《书西夏文感通塔碑后》说：

“余既考西夏文《华严》《莲华》各经，再取《感通塔碑》读之，欲为考释。奈汉译首三行已泐其半，不可卒读。

欲仅对书颂词以存其旧，毡搨不精，夏文模糊，更难辨认，且汉文颂词，每行十三句，句四言；西夏文颂，四、七言相间，每行十句，与汉文不类。如第三句夏文作“三世诸佛”为汉文所无。把观数四，无从着手。既又私念西夏天佑民安五年，当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距今八百余载，已有剥落。恐将来剥落愈多，更无可考。乃照录释文，并摘西夏文之可识者，以备博古之士考证。”

这些著述大约作于1926年以前，稿本未曾发表，现藏北京图书馆，知者很少。是否还有其它有关西夏的文章？不得而知。因此摘录介绍。

邓对藏文佛经的译著，现存者有《密宗四上师传》一种及另译《麦拉祖师传》等文章数篇。《密宗四上师传》译成于1933年左右，《麦拉传》等文更在其前。“四上师”是指出生在当时甘肃省（包括青海）地方的黄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以及嘉木样辖克巴、章加呼图克图，土观呼图克图四人。实际付印的只有宗喀巴、嘉木样二传。1934年，土观传译稿完成后，曾交先父张质生阅看，后不知下落。时值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我国东北，进而窥伺华北。也是英帝国主义阴谋控制西藏，想使其脱离祖国之时。他们除了政治、军事、经济的侵略外，还从民族、宗教、文化方面、制造种种谬论，进行侵略、邓在1934年1月1日为此书写的序言中指出日本密宗是由中国传去的。日本僧人空海^①来中国学习，回国后创造了日本假名字，文化上深受中国影响。自从五代乱后，中国的佛教密宗失传，现在转而求于日本，良为可悲、又以西藏红教传到元代，盛极而衰，舍本逐末，流于幻妄。所以内地一般佛教徒轻视喇嘛，加以訛毁。他说：西藏佛教

经典之富，喇嘛讲学之精，修持之勤，不但日本后学，不能望其肩背，即东方僧伽，也应对之有愧。宗喀巴改革红教陋习，尊重戒律，显密双修。实为佛教中兴功臣，藏人称为第二释迦。自此黄衣僧中人才辈出，不可胜数。他之所以翻译甘肃喇嘛传，是想叫人知道我国藏区不乏著作等身，得大成就者。这无疑是对帝国主义侵略行为的鄙视，也是对藏族同胞学习本民族文化的教励。这种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思想，是值得称赞的。

注①：空海（774—835）通称弘法大师，日本佛教真言宗创始者。唐贞元20年（804）来中国学密教，回国后，建立真言宗，称为“东密”。

（四）

邓隆的著作及其文学

邓隆的著作除前述外，涉及考古范围者有《枹罕考古记》一卷。原稿已失，我所搜集收存者现有《漓水、大夏水考》、《左南城考》、《黄河上游桥梁考》等。诗集有《壶庐诗集》一册，是1922年铅印本。共分《拙园缀锦集》、《新都杂吟》、《果州杂吟》、《古香斋诗草》、《拙园诗草》共古、今体554首。1922年以后至1933年诗稿均佚。仅于1930年铅印本《鹿鸣私宴集》中存有邓诗十九首及所附历年九月九日诗二十三首，后又搜得1934—1935年邓任夏河县长时所作诗56首，稿本题《居夷诗集》。又1935—1937罢官后所作诗八十首。皆未定稿，统为一册，名之曰《壶庐诗集遗稿》。又据所见共搜得1915年—1934年遗诗48首，名之为

《壺庐诗集补遗》。文集有《拙园文存》四册，现藏于甘肃图书馆者仅一册，有文八篇。余佚。我陆续搜得若干篇，名之曰《拙园文葺遗》。又得1905年所写日记残卷一册；及1911年日记二册：一为西北民族学院徐哲东先生自旧书摊购得，以无作者姓名囑叶寓尘相询而得存；一题《啸傲日记》，即这年后半年所记，与前日记残卷均为其族孙邓昌《字世五》所存。借抄后，原稿均还本人，“文革”后抄本尚在，原稿收藏人均已下世，其存否不知下落。其他尚有《敬恭桑梓录》一册，分上下二卷，铅印本，系邓在民国初年所作之公牋及杂著。另外，甘肃省图书馆文献部存有《调查灾情日记》（1929年1—2月）、《拉卜楞纪略》、《宗教志》及邓隆手札稿（是1925年一月起邓任自治筹备处长时幕僚代拟应酬信稿，参考处不大，并非手稿）。及我家原存《邓德舆手札》一册。

1929年邓隆参与编修《甘肃通志》，曾任省通志馆分纂，编写了民族、宗教、土司等志，均有抄本。

此外，关于西夏文著述四篇（篇目见前），清稿现藏北京图书馆，近已复制。《密宗四上师传》为三十年代铅印本二册，尚有存者，其余如《密藏问津录》、《番佛名义》、《藏文注解》、《文字般若集》等，今知其目，下落不明。

邓隆殁于兰州城内贤候街寓所。我和郭杰三先生于其书室，将所见著作检点列目，而在拙园所存者未计。以后兰州屡受日寇空袭，其家将所有存稿移于拙园。后其长子春暄卖给了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水利部经理赵世暹（字敦甫）、我闻之后，向赵商洽赎回，已得同意。并先以蜀中日记十余册及其它杂稿共四十余册交我而其他较为重要著作及佛学著作、

则托其他人借阅未归，后欲以我家所藏西夏文《华严经》交换，我未同意，不久，抗战胜利，赵将离甘，闻之往访，并商此事，则以行李已经交运，他日再作商量而罢。后不知其所在，1960年偶买胡道静注《梦溪笔谈》，后记中言赵在南京水利学院任教，时正下乡，未及联系。1979年至北京，在清华大学黄万里教授处询知赵已经逝世。这一批遗稿无从查问。竟成憾事！但赵是一个收藏家，邓稿曾在甘肃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发现数种，皆得自赵处。或者已作处理，未遭浩劫，亦未可知，而曾经索还之四十余册，邓之次子春莫请求交他保存，即允全部交付，并“嘱其开一目录，迁延未办，故今不知存在何种？1957年我曾商请存于炳灵寺文物保管所，未得同意，闻在十年动乱时全部损失。解放以后有人曾在兰州书摊发现邓之日记，又在临夏邓世五（昌）、李静斋、祁植等处，亦见日记诗稿等。日记已经抄存，诗稿皆为编印《壶庐诗集》的清稿，我据以校阅印本，批注眉上，经过“文革”之后，我所存者幸在，其它亦不知下落。吾甘地方献本少，而有些前人著作，多未刻印流传，以致淹没无闻，这也是造成甘肃文化落后的一种原因。

邓隆诗文皆有造诣，文章精炼，所存不多。诗则早年所作的一部分，曾经结集定稿，有王、孟、韦、柳风韵，文县程天锡（字晋三）评其诗清矫拔俗，时多奇艳之句。而和平忠厚，卒粹然一归于正，不蹈诸家流弊。”“新都、果州杂咏、状景道情，皆能自出机轴，一洗白窠。而一吟一咏、尤念念在民、其胞与之怀，往往流露于字里行间，所谓文章饰吏治者也”。并称：“其诗逸宕和平，无一诡涩艰辛之语”。镇原慕寿祺（字少堂）摘举诗中“远山淡若烟”及“新月窥廉人未